

## 敏感性概念（译稿）

张曙光

敏感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在今天重获新生。本文对敏锐性概念的源起及布卢姆的方法论谱系进行了梳理，并回溯了它在当代的广泛应用，以期能阐明如此类概念是如何使用的。“侦探性工作”则显露于研究过程之中。与此同时，我也将在本文中透过一般性社会过程（generic social process）的观点展示一下敏锐性概念的有用性。

### 何谓敏感性概念

敏感性概念是一种自然生成于研究人群之中的意义，它允许我们领会人们对其周围世界所赋予的意义。布卢姆曾指出“敏感性概念在使用者处理经验性实例（empirical instance）时，能够给予其一种参考感与方向感——即提示出研究的前行方向”（Blumer, 1954:7）。如果建构合理，敏感性概念则必然会包含有研究对象用以解释其世界的语词和想法，那么相比之下，还有比使用敏感性概念更有效的能捕获此意义的路径吗？敏感性概念是从研究参与者的视角抽绎出来的构念（construct），即以研究者的语言或表达使研究者敏感于可能的研究路径。

### 源起与谱系

符号互动论为敏感性概念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从杜威等经验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脉络来看，符号互动论旨在寻求科学思维与现实行动的谐调，诉诸于经验（Palmer, p.227）。在处理“经验”时，研究者必须把握住社会行动者在其理解及行动中所注入的意义，正如布卢姆所言：

“符号互动论”当然指的是人际互动的独特性。此独特性在于人类能够主动解释或界定他人的行动，而不仅仅是对他人行动做出反应。即其反应并非直接受激于他人行动，而是基于其对他人行动所赋予的意义。因此，人际互动是透过解释或确认他人行动的意义的方式以符号的使用为中介的。就人类行为而言，符号中介等同于在刺激与反应之间插入一解释过程。(Blumer, P.180)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功能主义等在当时颇为流行的理论对经验世界作了截然区分。布卢姆一度在其 4300 字的评论“社会科学错在何处”（What is Wrong with Social Theory）中，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它们存有“严重缺陷”——理论的过于简括使其疏离经验世界（Blumer, 1954:3）。在布卢姆看来，以社会系统、文化要求(cultural demands)及制度压力(institutional stress)为基础的宏大叙事将人看作不相关的“携带者”（carriers）(Warshay and Warshay, 1986: 181)，却忽视了人还是一行动者的重要事实。对统计测量的倚重及所使用的概念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是布卢姆难以认同的。正是基于对这些有着明显缺陷的理论的不满，他提出了一个简便的研究路径——敏锐性概念，它在获取经验数据、生成理论的研究实践中表现出相当的有效性。

至于敏感性概念的源起，我们则可追溯到一些对社会学的发展深有影响的重要著作。其中为人所熟知的就是 Simmel 的社会形式（social form），它代表了一种对“元素来自经验原材料”的思想叛离，将它们塑造成“决定性的单元”（determinant units）(Levine, 1971:xiv)。社会形式根源于经验世界与社会经验，但从一种隐喻性意义上来言，它们获得了自身的存在。从另一侧面而言，敏感性概念根源于特定经验世界，但基于进行分析、生成理论的目的，它们自身则必须获得一种客观的形式。这极其类似于日常对社会世界的主观理解，它也是研究者所处生活世界中共通的协议(Emmet and MacIntyre, 1970:1)。

当社会研究者面对一堆数据，并未有清晰的研究思路时，敏感性概念也就成了研究的起点，引领研究的展开。它通常是临时性的，一旦在研究进程中有更具体且适切的概念显露出来，则可将之替换掉。敏感性概念易使研究者敏感于一个

对先前知之甚少的数据所作的特定分类。当我们对某一社会背景或人群了解甚浅时，使用敏感性概念将有助于我们“确定相关问题及假设”（Becker, 1958: 653）。总之，在处理经验数据时，我们可以将敏感性概念用作一种“大致的参照感与方向感”，从而将经验世界与社会世界统合起来：

如果我们的经验世界将其展示为独特的事件或情境，而我们则希图通过对世界的直接研究建立起对客体的分类，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使用敏感性概念。

（Blumer, 1954: 8）

敏感性概念提示出了研究前进的方向（Blumer, 1954: 7）。敏感性概念也是一种“二级”（second-order）概念，与数据相隔一步，但可保证的是，它所采用的是研究参与者的视角。作为“构念的建构”（construct of constructs），社会学家将敏感性概念用作一个深思熟虑的生成理论的策略。

## 理论价值

布卢姆无意于将这些概念具体化，对特定数据进行清晰辨识。在其看来，使用敏感性概念要优于具体概念。因为敏感性概念的使用能够促成研究的开放性，使之不至于走向封闭，所以，它在经验性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实践中最为有效。以此归纳方法来研究宏观现象，则允许研究者从个体在具体互动情境下的持续性符号化过程中抽绎出一般性的结论（generic statement）（Turner, 1978: 401）。相比照而言，C. Wright Mills（1959: 34）毫无想象力、几近销声匿迹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体系中的概念（concept）的首字母“C”应是大写的，相反，敏感性概念的首字母“c”却是小写的。

敏感性概念借以表达的是经验事件的“具体独特性”（concrete distinctiveness），并非经验研究的抽象框架（abstract framework）。布卢姆所唤起的我们对未知社会地带（social terrain）的表象正如一必须横穿的山水景图，

曾经受过训练的眼睛使我们注意到其在地图上显现出来的基本地形特征，山水的走势曲线则允许我们推测其中可能存有的路径。当我们接近现实经验实例时，这些图形特征就能使我们进一步区分出该景观的独特性。试探性的求索则使我们敏感于横穿该景观的任何可能性。尤其是景观特定而具体的展现形塑了我们对其所持有的概念，而透过此概念，我们能够发现存在于其它类型景观中的具体实例。

布卢姆在 1954 年对使用敏感性概念的倡导，终结了其对科学与常识概念长达 23 年的学术关怀。他认为，模仿自然科学而来的概念疏离于经验世界，它们在无视其需要的情况下得到了轻率地生产。这些概念往往因其对某些客体标以相应概念进行解释，而倾向于终止进一步的探求。同一历史时期的学者 C.Wright Mills 也曾以“抽象化的经验主义”，对处理数据以使其适合于测量的操作进行了描画（Mills, 1959: 50-51）。

最后，人们在理解社会科学中的概念时，往往是一知半解，对它们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布卢姆在其于 20 世纪 40 年代发表的“社会心理学中概念问题”（The Problem of Concept in Social Psychology）一文中，指出理论与观察之间的沟壑使得社会心理学研究进退维谷。在他看来，社会心理学家不仅建构了缺乏理论的经验主义（atheoretical empiricism），而且创造出难以经由经验证实的概念。

## 社会研究的现时现象

社会学家着实一直在悄无声息地支持敏感性概念的使用，符号互动主义者及其同道者也在不断地发掘布卢姆著述的丰富内涵(Fine, 1990: 147)。收录在《社会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中的《special issue on Herbert Blumer's Legacy》

（Spring 1988）一文就颇有说服力地阐述了布鲁姆对人际互动研究的广泛性贡献。

第一，尽管敏感性概念具有不可见性，但我们还是发现其被用于现时社会学研究中的多个领域，虽然有时并不是以此命名。比如，格拉斯（Barney Glase）和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characteristic），直接指向“从数据中发掘理论”，可谓是对布卢姆敏感性概念的直接承继。所不同的是他们以分类（category）这一术语指称敏感性概念，但仍将概念视作一种较高层次的抽象。正如布卢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反对功能主义与心理主义一样，格拉斯和斯特劳斯也同样反对默顿（Robert Merton）的“中层理论”（theory of the middle-range），由因及果，其主张在研究之初，群体、背景及方法不能具体化(Hammersley, 1989: 173)。在这一研究路径中，理论观点是随着研究的展开而显露出来的。格拉斯和斯特劳斯两人告诫我们不要因丧失“潜在的理论敏感性”（potential theoretical sensitivity），而对数据的洞见视而不见或有所抵触。在《社会科学中的发现模式》（Patterns of Discovery in the Social Science）一书中，Paul Diesing 将敏感性概念看作是“整体取向理论的基本构成”。John Lofland 则将其著述《扎根理论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视作是“对发展微型概念的吁求”，即依循相应程式来创造此类概念。

第二，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工具，焦点团体的发展也应归功于布卢姆的主张——“讨论或资源群体”（discussion or resource group）是发展敏感性概念的一个途径。他认为，以群聚的方式探讨个人生活领域，此间他人异议的表达更有助于透过表面看本质，这是其他研究途径所不能匹敌的。焦点团体由一小部分人员构成，让我们暂定十个，他们是由研究者基于以下一种或多种原因召集在一起的，即旨

在获取与研究问题的相关信息；因时间紧张不能进行一系列的一对一的访谈，只好以群体性访谈替代；便于汇总观点与解决方法（Berg, 1995: 68-69）。David Morgan 提醒我们说，焦点团体根植于社会学，确切地说，是默顿与肯德尔（Patricia L. Kendall）在1946年的著述，尽管营销研究也发现焦点团体极为有用（Morgan, 1988: 10,11）。布鲁姆虽不是创造“焦点团体”术语的这一人，但其对运用焦点团体的研究方法推进敏感性概念发展的深挚兴趣及所作的相应努力，使焦点团体广为人知。

第三，近年来，在本学科领域，不断涌现出的学术著作滋育了传统及新近发展起来的质化研究。大量有关质化方法的教科书的出版及所谓新的人种志（ethnography）的提出均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相比于其他研究，人种志更为强调理论的关联性（relevance of theory）（Fine, 1990: 131），当前亟待提供一种更为生动的理论，能够使人种志数据明白无遗，并将其转为适切的概念。

第四，在今天，敏感性概念已广为社会科学家所使用，但他们似乎觉得不再有必要对布鲁姆的贡献心怀谢意。事实上，任何概论性的社会学教科书，甚至有关方法论的教科书都未能明确提及敏感性概念。《社会学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也是如此。一些明确涉及到质化研究方法的教科书同样忽略了敏感性概念。换言之，敏感性概念的成功应用随处可见，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却了无踪迹。有且仅能寻见一个令人为之欣慰与信服的例外是《建构社会研究》（Constructing Social Research），Charles Ragin 在此著述中简明扼要地从两个方面对敏感性概念作了较为全面的界定。

新近，自《敏感性概念的使用》（Working with Sensitizing Concept）一书出版以来，学界对敏感性概念的兴趣正在复苏。土耳其有关质化研究的社会学期刊

《Kwalon》近来推出了数篇论文，均是围绕着我在著述中所提及的问题进行展开讨论的。其编辑也计划在将来陆续出版的数期《Kwalon》中辟出专版以供研讨敏感性概念的使用。就目前来说，敏感性概念已在许多国家的多个研究领域广为流行，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中国、德国、英国及美国。

## 使用敏感性概念的具体实例

### 社会学研究

贝克尔（Howard S. Becker, 1927）在其研究提出了数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敏感性概念。他对其如何洞悉医科学学生的生活的解释可用“crock”一词加以阐明。贝克尔曾在教学医院随从一队医科学生时，闻听一位学生将一位病人称作“破罐子”（crock），他便有意识地对此予以了持续性关注，在问询了多位学生之后，方才认识到医科学生们是在将“破罐子”界定为主诉繁多，但并无明显躯体症状的病人。从这些病人身上很难学到医学知识，所能做的只有与之交往，安慰他们。在医科学生看来，“破罐子”无益于他们的临床训练。这些病人并无明显的躯体症状，因此，医科学生只得依据其所学知识轮流照顾他们。更甚者，“破罐子”占用的时间远远超出了医科学生可支配的处理时间。这些病人通常有着较长的病史、多重症状或手术，倾听他们的主诉自然就占用了许多宝贵时间。

贝克尔对医科学生即兴使用特定词语“破罐子”的探究，揭示了医科学生接受教育的更大一方面，即确立什么是有用的病人、时间问题及痊愈。

戈夫曼独特的研究视角是将社会生活比拟作演剧、剧院，这使得他在其著述中仔细考虑了不少的概念。尽管其从未标榜自己为互动论主义者，但鉴于他在微观社会学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Collins, 1994: 277），我们还必须将他算作

是敏感性概念的重要发展者。也正是戈夫曼对敏感性概念的孜孜以求，才使得一学者声称“戈夫曼提出的概念远远多于被引用的”（Lofland, 1970: 38）。

在第一阶段，戈夫曼对互动仪式（interaction rituals）进行了更值得记忆、更为生动的描述，可谓是对敏感性概念的共鸣。他对互动性行为的研究激起了众多学生、社会学家及更多公众的兴趣。

格拉斯和斯特劳斯两人一向是与扎根理论联系在一起，尽管两人的学术歧异愈来愈大，渐趋明显。Wayne Babchuck（1996）曾指出格拉斯认为：

扎根理论是一种颇具放任性（Laissez-fair）的操作类型，其具有一种内在的灵活性，主要受被调查人及其社会建构现实的引导。在其看来，被调查人的世界会随着分析的展开而自然浮现出来，研究者则无须过于关注此研究过程。

顺沿着这样一种路径，敏感性概念就可以蓬勃发展起来，并会推动理论的发展。

Arlie Hochschild 著述中充溢着从人们日常经验中抽绎而来以及反映其经验联结的术语与概念，并将它们联合成更高一级的概念。比如“感激经济”（the economy of gratitude）所涉及到的正是在婚姻关系中，谁给表达感激，谁接受感激。比如，妻子感激自己能有机会在外工作，在家则会以干双倍的家务来表达其感激。该研究中也有一术语（或概念）“无力策略”（incompetent strategy）——女人装病以诱使男人做家务的一种方式。同样，男人也会采用同样的策略来逃避繁重的家务，无论是洗衣服，还是刷盘子。他在另一以航空服务生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奴使的心》（The managed Heart）中所提出的几个概念已被纳入社会学知识体系，且广泛适用于其他诸多背景。“感情规则”（feeling rule）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一种表现真诚礼仪（sincere civility）的形式。一个礼物会在特定背景下唤起适宜的情感，它赋予个体的情绪管理以一定社会模式（Hochschild, 1983:18）。

术语“驭使的心”（managed heart）显现出人类是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达成某一商业或其他功利性目的。

### 其他领域

只消在网上通过 google 检索一下，就能获取到 531 条与敏感性概念相关的实例(9 March 2006)。比如，曾就教于纽芬兰纪念大学（Memorial University）的弗隆(Anne Furlong, 1997)(现任教于爱德华王子岛大学)认为相关理论（relevance theory）一贯从其使用中获益。相关理论不仅适用于文本（言语或书面）以及需要了解沟通者意愿的情景，而且适用于观察者必须解释的任何假设。依照弗隆的观点，“我们人类生来就是要去检寻点滴信息，即所谓敏感性概念，不仅在文本之中，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每一瞬间”。在解释性文本中，她将此过程称作“寻求最佳相关”（seek for optimal relevance），它不仅受限于言者或书者的动机，也受制于被试的需要、欲望及心理状况（mental landscape）。

在**伦理学与护理学**领域，高卢（A.L.Gaul, 1995）使用敏感性概念探讨了存在于理想护理实践与现实护理实践之差距中的伦理困境（ethical dilemma）；身兼教师与护士两职的麦金托什（MacIntosh, 2002）研究了护士对她们的专业成长的认知；Xiao 与 Smith(2003)则使用敏感性概念研究了多元文化社社区的居民对种族文化事件知觉的多样性。

敏感性概念似乎更适用于**家庭研究**。William Marsiglio(2004)在研究中聚焦于父母需要（parental claiming），发现一系列敏感性概念展映出继父试图发展一种群体归属感及父亲化认同（father-like identity）的努力；马西里奥（Marsiglio, 2004）则在研究男青年作为生殖体的主观经验时，界定了两个敏感性概念——“生殖意识”（procreative consciousness）与生殖人（procreative being）；利普（Holger von

der Lippe, 2003) 研究了低生殖率背景下的父亲概念; 克尼格 (Cynthia Koenig) 与坎宁安 (Walter Cunningham) (2001) 则探讨了中年期的迁居对人格、未来定向及社会伴侣选择的影响。

在**社会工作研究**领域, 敏感性概念已经成为加拿大社会工作 邮寄列表讨论 (listserv discussion) 扩展的一个特征, 克卢斯(Rosemary Clews, 2002) 由此在其推动美国东海岸乡村反种族主义社会工作课程 ( anti-racialist social work curriculum) 发展的实践中, 发现了敏感性概念的使用价值。

与乡村生活研究相对照, 基纳 (William Keena, 2000) 在研究大学学术职员作为当地新兴知识技术的守门员所扮演的角色时, 发现使用敏感性概念同样是有有效的。沿着相似的研究路径, 塞特雷 (Alf Saetre, 2003) 研究了挪威与美国组织成员对**组织环境**的创建及媒体使用 (media use)。他透过 72 个访谈探究了成员是如何创造其组织环境的, 并聚焦到敏感性概念“脚本” (script) 上。阿特 (Art, 2003) 则研究了多股东互动中参考框架的多样性 (frame diversity)。

在**教育**领域, 米凯瑞 (Maena Micari, 2004) 分析了 10 位成人重返大学校园的经历, 其间有六个主题从所获数据显露出来; 澳大利亚的斯太摩派勒斯 (Elizabeth Stamopoulos, 2003) 探讨了教师对小学层次教育创新的概念及行为定位 (conceptual and behavioral orientation)。与此相关, 米勒 (Malcolm Hill, 2004) 则在其研究中基于儿童与青少年的愿望表达, 探究了儿童的参与及社会容纳 (social inclusion)。这种分析具有较强的艺术性, 在一个研究中, 研究者曾透过教师的绘画分析了其对管理的态度。

中国心理学家刘力, 也许是联合王国中部 (middle kingdom) 少有的数位进行质化研究的研究者之一。他使用敏感性概念, 并参考社会表征理论, 探究了中

国人的**社会认知**。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以其对敏感性概念的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贝克尔曾在谈及其在研究医科学学生的临床教育时所采用的思路及研究方法时，将敏感性概念“破罐子”的使用看作使“侦测性工作”。

### 有关“侦测性工作”的现时研究实例

我有关敏感性概念的著述的推出，与一股新生的反映理论与数据之间自反性（reflexivity）的潮流相并行。然而，正是在1994年于安大略湖沃特卢大学（Waterloo University）举办的质化分析会议（Qualitative Analysis Meetings）上，来自尼皮辛湖大学（Nipissing University）的坎瑞斯（Uldis Kundrats）博士的报告明确无疑地为这一卷著述奠定了经验性基础。坎瑞斯在其学习用钢琴弹奏忧郁布鲁斯歌曲之余，记录下了大量的田野笔记（field note），这些田野笔记则构成了其报告的基础。

返回弗雷德里克顿（Fredericton）之后，我便知悉蓝十字会（Blue Cross）要举办一次语言障碍矫正研讨会（Speech therapy sessions）。对自己的欧洲语言习惯已影响到课堂教学的强烈意识，促动我参与了这场探讨会。其间，我在坎瑞斯研究实践的鼓动，坚持记录下了相应的田野笔记。直至第五场，我与治疗师讨论了我的田野笔记。借此机会，我与其分享了我的发现：作为一位治疗师，为了有针对性的治疗，其任务在于确认特定的语言类型（speech pattern）。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受过语言矫正的训练，我最初也只是在传递自身对语言障碍的日常经验与理解，而她作为治疗师，却会据此赋以独特的技术术语。交谈间，她说：“哦，你以为我是做侦测性工作吗？”。于是，“侦测性工作”作为一个崭新的敏感性概念也就由此生成了。

以侦测性工作为特征的互动背景比比皆是。比如，在日常巡护中，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在从睡眠中醒来的感受：身体持续性地僵直，不能动弹，几乎成了一个“活死人”。对此，医生可能会问一些问题，以帮助其确认一个与该症状相对应的医学术语。最后，她发现这是癔病（*hypnagogic hallucinations*）。

下面仍以此医学背景为例，进一步分析侦测性工作。医生对“医院流浪者”（*hospital hobos*）是再熟识不过的，“医院流浪者”在这里又是一个敏感性概念，就是指那些捏造病况，游荡于医院与医生之间的人。此时的侦测性工作便愈发有趣，因为所谓“病人”颇具想象力地泄漏出一定线索，诱使我们对此做出相应反应，正如一位成人“制造”出了儿童的症状一样，侦测性工作渐趋强烈。心理学家早已将此解释为线索转移（*transference of clues*），即代理性佯病症（*Munchausen-by-proxy*）。这类侦测性工作很常见的，但它们已经超出了医学领域。

在学期开始，一个学生走进您的办公室，要求选修您所开设的课程。基于“选课人数已爆满”等一些外在因素，你不大情愿接受其请求，便会对此进行一番侦测：“为什么想选修这门课程呢”、“你熟悉社会学吗”、“这个班级有你认识的人吗”、“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在相互侦测的过程中，两人都进行了有礼貌的回避（*civil inattention*），即你避免回答任何有关其他班级的问题及此学生在该班是否有朋友，或者另一班级的课本是否非常昂贵，也不会去问有关其他指导者的问题。而学生同样精于此道，在言语措辞上力求以情动人，诸如“我起得晚，赶不上早班”；“我不习惯晚班”；“在你的开课时间我不必工作”等。此互动展示出了学生向您传递线索的过程，可将之理解为一“侦测”过程。

如此之类的互动不计其数。一位教师向学生家长传递线索——该学生在班级表现不好也便是一例。教师也许已毫无疑问地确立了一个事实，他可透过其他方

式暗示或微妙地指出这个孩子在校表现，尤其是在父母感到困惑的时候。父母就很希望地透过成功侦测内化了教师所传递的含蓄性暗示。

## 一般社会过程

一旦我们确认实证发现包括有相似的个案或具体代表性的取样，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它对本领域的理论贡献。在质化研究中，敏感性概念可以成为理论架构的基础。对于质化研究者而言，其问题则在于确立各变量之间的相关，从而进行理论概括。丹森（Norman K Denzin, 1989）曾对此作了进一步引申：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检寻“普适于各大同小异背景的形式”。

我在前文已经强调质化研究者深为关注的是调控日常生活的社会过程。鉴于敏感性概念的建构关涉到社会过程的研究，我向质化研究者建议，理论发展的重点在于社会过程的可外推性（transferability），即推广至其他背景。约翰与罗弗兰德（Lyn Lofland, 1995）则将之称为“跨背景普适的模式”（trans-settings patterns），格拉斯和斯特劳斯(1967)认为：

这种理论分析形式充分利用了指标的可交替性（interchangeability），随着分析的展开，就会发展出更多可以接受的指标，进而对之进行归类（也即敏感性概念），并可厘清其性质。

有数项技术可用以帮助我们着手建构理论。其中一项技术就是“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即参照以从其他比较群体中获取到的证据（Glaser and Strauss 1967:23）。人类学家虽已经使用该研究技术长达一个世纪了，但他们主要是将其应用于文化的宏观分析。直到现在，质化研究者才采用这项技术来对文化进行微观分析。比如，我们已经了解侦测性工作是如何发生于其他背景之下的。在以专业人员或专家与顾客或病人之间的初期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个案研究中，我

们已经确定了最初关系的某些特征：专家必须诊断病人或客户的症状，这就使得专家以特定的技术术语标定病人的状况成了自然之事。

我们一旦确立侦测性工作的敏感性概念，就要寻找其他关涉可借以说明专业人员与客户之间关系的案例的背景，由此，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实证发现推广到其他背景。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关节点上，即使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我们也是将获自于某一背景的知识迁移到新的背景。在这一点上，卡玛日(Kathy Charmaz, 1991)提出了一个有用的敏感性概念——辨识瞬间 (identifying moments)，即“辨别出新的自我形象生成的瞬间”。具体而言，在此瞬间“有所顿悟，意识到潜在的自我形象或获悉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一个社会研究者会很容易将此概念推广到某人对崭新的自我形象突然有所意识的背景，它既可以是一位遗孀在看过生命统计表 (vital-statistics form) 中所显示出的自己所在人群 (或遗孀) 的统计数据之后，对其新地位的意识触及她的痛处；也可以是一位刚踏入大学校园的大学生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名高中生了。对于研究者而言，关键在于要对此可广泛应用的概念烂熟于心，并尽可能使用。当我们将此概念推广到其他背景时，我们已经为该领域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

至此，尚余一问题：如何使用敏感性概念，才能对理论发展有所贡献，并提供相应的分析视角？读者应明晰的是在创造敏感性概念时，应与数据保有一定距离，即使之客体化。泽如巴维尔 (Eviatar Zerubavel, 1980) 在尝试着将齐美尔的社会形式理论与现场研究相联结时，认识到敏感性概念在激发理论洞见 (theoretical insights) 的使用价值。正如其所声称的那样，社会学理论的目的在于“超越具体现实”，其必经一从现实中进行抽象概括的过程。在泽如巴维尔看来，作为从具体背景的现实存在中析解出社会学模式 (sociological

patterns) 的主要工具, 敏感性概念是必需性的。敏感性概念也就成了”超越背景具体细节的分析推论”(Fine, 1990)。在迪辛 (Paul Diesing, 1971) 看来, 敏感性概念间介于对世界的观察及理论建构, 沟通了两者。诸如仪式、角色及社区等敏感性概念已经成为整体取向理论的基本构成。

一般性社会过程 (generic social process) 构成了将某一特定发现推广至其他背景的重要路径, 这一术语是由普拉司 (Robert Prus, 1987) 创造的, 其旨在透过同上主义 (particularistic) 的人种志数据来描述“人际联结的核心特征”。切莫忘记, 符号互动主义者所关注的是活动 (比如, “人们之间相处的方式”等)。使用敏感性概念同样允许在理论上将来自其他背景的人种志关联起来, 从而做出相应的理论概括。普拉司还提出了数个适用于人类活动的一般性过程, 即获致性视角 (acquiring perspective)、认同获得 (achieving identity)、参与 (being involved)、参与活动 (doing activity) 及体验性关系 (experiencing relationship)。

## 结论

最后, 我将从著述中引用更宽广的思想立场 (ideological stance) 来结束我的报告, 即:

也许需要后退一步, 再度审视我的观点, 方才意识到我所称作“沃尔玛社会学” (Wal-mart sociology) 在当今学术界的重要影响。“沃尔玛社会学”是一种非实证主义社会学 (neo-positivist sociology), 其研究问题及研究过程具有高度标准化的形式……这一过程正因社会研究的共同投入 (corporate funding) 而不断得到提升……

我相信，我对使用根植于数据的概念的倡导，将消除虚空的、预设驱动的研究（hypothesis-driven research），并在社会学中培养起一个崭新的愿景（original vision），它有望与指导现时研究及研究投入的因素研究（variables research）两足鼎立。对学生及其他人而言，敏感性概念可用作对抗世俗的共同研究，重寻以人为中心研究的激情的一种工具。

---